

清代李元春《左氏兵法》： 点评《左传》兵学理念

□ 丁 涛

《左传》是中国历史文学的重要典籍，其兵学理念也极具研究价值。与一般理论形态的兵书不同，作为编年体史书的《左传》保存着丰富、详实、生动的春秋战纪，能使读者直观感受形势计谋的由来，实为兵法原则的案例集。清中期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元春（今陕西大荔人）对此便有精准的认识，其所撰评点体《左氏兵法》分上下2卷，共辑评《左传》180场战事，收录于《青照堂丛书》。在开篇中，开宗明义地指出“《孙》《吴》所言，空言也。《左氏》所言，验之于事者也”，即实证《左传》要与兵法结合研读，才能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。

“战胜以文教”：政略决定战略

《左传》对530余起春秋战事的呈现是全面深刻的，如成公十三年秦晋“麻隧之战”前，周简王大臣刘康公批评成肃公参加会盟的不恭敬态度时，提出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经典命题，体现出军事与政事并驾齐驱的战略认知，高度重视善政与用兵的辩证关系，在《左传》中的表述与施行是一以贯之的，李元春对此多有点评。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对晋文公城濮一战“取威定霸”的原因进行了阐释：即在大臣狐偃的建议下，采取“出兵勤王”“入务利民”“作执秩以正其官”等举措，大兴“文教”、施行善政，训练军民在义、信、礼方面达到知行合一。李元春点评指出“皆圣贤之道，而用之自是霸术。然战胜以文教，亦正谭何容易”，将晋文公成就霸业归结为整顿政治、强盛国力，训练民众、赢得人心，对其“战胜以文教”原则的贯彻，给予了高度赞扬。同样的，据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记载，楚武王欲东扩汉水，在与随国大臣少师和谈时，故意以“羸师”诱其出战，而被随国季梁识破，引发了对勤修内政以强大自身的议论，季梁奉劝随君不要轻易出战，指出“所谓道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上思利民，忠也；祝史正辞，信也”，李元春点评道“此战胜根本”即能战的前提是行善政，修明五教、敦睦九族才是家国安稳的根本，事实也正是对内“修

政”团结民众、对外“亲兄弟之国”赢得支持，才有了“楚不敢伐”的效果。

再如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晋楚“鄢陵之战”，楚军将领子反战前向申叔胜问情势，申叔由“德、刑、详、义、礼、信”切入，认为楚国“内弃其民，而外绝其好”“而食话言”“疲民以逞”是典型的悖德、弃信、无义，准确地预见楚军必败，李元春点评时再次精练地指出修明政事是“行师之本”。

“战胜易，守胜难”：用兵必要高瞻远瞩

《左传》提炼战事要领之突出堪称典范，集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深谋远虑的精髓。如宣公十二年晋楚“鄢之战”，楚庄王获得大胜后，否定了大臣潘党“收晋尸以为京观（即堆积敌军尸首用土封之，以示军功）”的提请，提出“止戈为武”及“武有七德（即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）”的经典论述，反映出用兵讲求高瞻远瞩而非局限于眼前之利的胸怀格局，李元春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，揭示出用兵“战胜易，守胜难”的意蕴。

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记载了著名的“蹇叔哭师”事件，即秦穆公为眼前利益所蒙蔽，欲以“潜师”偷袭郑国，秦国上大夫蹇叔劝阻道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”，认为如此劳师千里极易暴露，是兵家大忌，根本达不到突袭目的，并预见到了“崤之战”惨败于晋的结局。李元春对此评价道：“老臣（蹇叔）深见事理，可为勤远略者戒”，并引用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“百里而争利，则擒三将军”，“五十里而争利，则蹶上将军”，指出行千里之劳看似有利可图，实则是得不偿失。果不其然，秦军行至滑国时，便被郑国商人弦高遇到，弦高假以郑穆公名义慰劳秦军，并把握即将攻打郑国的情报传递回国，秦军不得不无功而返，只能以顺道攻灭滑国弥补出兵所费。李元春对此感叹道，“偶尔之昧一念之验，便是大机”，事实也是如此，当秦军满载从滑国劫掠的战利品归国之际，在崤山遇到了晋军的伏击，几乎全军

覆没。

接着，李元春选取了秦晋“崤之战”，两相参看，颇具深意，因此役同样因晋襄公的贪利短视而起，虽然截获了秦军大量战利品、生擒了秦国三位领军将帅，但从两国关系长远来看，严重破坏了“秦晋之好”，以致两国兵连祸结、民不堪命的双输局面。

“知己知彼，须并知其情”：每战必慎始善终

《左传》对“慎战”思想多有阐发，如战前须贯彻“知己知彼”；作战过程讲求“慎始善终”，不打无把握之仗；极力避免因轻敌而致“覆军杀将”的败局。李元春对此类战例的点评，可谓把握住了“知兵谋胜”的关键。

《左传·隐公九年》北戎侵郑之役战前分析时，郑庄公指出“彼徒我车”，即北戎步兵机动性强而车兵无法制约的现实问题，公子突针对北戎“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；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”的特点，提出以诈败诱其冒进，设置三批伏兵截击包抄的建议，结果取得大胜。李元春对公子突基于敌我情势特点认知的分析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，进一步提出“知己知彼，须并知其情”的精要论断。再如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齐鲁“长勺之战”，曹刿贯彻了“慎始善终”的作战原则：击鼓于齐军三鼓之后，利用了齐军急于求战的心理，故意迁延时间以泄其士气；在是否追击齐军时，曹刿慎重地“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”，在看到齐军车辙混乱后，才下令出击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可能的伏击。李元春对此役精要之处进行了细致梳理，对曹刿所说“夫战，勇气也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，提出“合阵者须知”；对“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”，点评道“逐北者须知”；对“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”，夹注道“师退以此观之”，认为这都是战场指挥要格外注意的基本原则。

反例也有不少，如僖公二十二年鲁郑“升陞之战”，鲁国轻视郑军“不设备而御之”，鲁大夫臧文仲对此提出“国无小，不可易也。无备，众虽不可恃也”，认为小小的毒虫都会带来危害，更何况是前来攻伐的国家，鲁君

不听而致兵败，其本人丢盔弃甲，被狠狠羞辱了一番。李元春对臧文仲“临事而惧”给予了高度评价，总结出“轻敌必败”的深刻教训。

“诡道”：兵家的权变与任势

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明确点出了“兵者，诡道也”的著名论断，并进一步提出了“诡道十二法”，即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。这些在《左传》所言兵事中均可找到印证，李元春选取其中代表性的战例，作了简明精深的点评。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记载了秦晋联手讨伐郑国的情况，此时郑国都城密有楚军协助防御，秦军首先是故意绕道丹江，在析地用自己的士兵伪装成敌方俘虏，并扮演楚军统帅斗克、屈御寇，特意在密城下自导自演了一场秦楚结盟的戏剧，都军误以为被协助守城的楚军出卖，加上秦军已兵临城下，随即便投降了。李元春认为此役以假借己方士兵伪装成俘虏，达到了惊扰震慑敌军的目的，又以假装与“楚军”达成城下之盟，进一步击破都国守军的心态，最终迫使其不战而退的战法，对这两次诡诈手段的运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指出是兵家“诡道”的典型手法。

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所描绘的齐宋联军与鲁军之间的“乘丘之战”，也是根据战场形势作出权变的典型。鲁国公子偃在看出宋军容不整的情况下，提出先集中兵力击败宋军、齐军则会不战而退的战法，事先未得到鲁庄公允许，公子偃依然坚持出兵，以“虎皮蒙马”对宋军发起猛烈冲击，而后鲁庄公见局势有利，便指挥大军一起进攻，取得了大胜，结果正如公子偃所料，齐军不战自退。此战，李元春敏锐地观察到“虎皮蒙马”是开创性的战术，此法在后来晋楚“城濮之战”中，被晋军将领荀息效仿取得了相同的效果；对此，进一步总结指出“用兵往往饰为神奇，所以助己之威，即以夺人之魄”。

（上接1版）

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。西方工业文明在发展中带来的现代性危机逐渐显现，引发阶级分裂、贫富分化、价值冲突和社会对抗等问题，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第二次现代化的问题。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、比较和批判，中国式现代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文明智慧，较好避免了西方工业化中曾经出现的问题，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借鉴。

中国式现代化将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，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，共同创造世界美好未来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文明成就，从文化的角度，它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本邦、为政以德、天人合一、亲仁善邻等价值理念，吸收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各国文明发展中积累的先进科技成果、有益管理理念和人文精神，肩负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。同时，强调平等、互鉴、对话、包容的文明观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，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、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。

更全面、更生动、更有效地讲好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

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故事，是当前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。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，是新时代中国最真实、最广泛、最生动的发展故事，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提供了一个观照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、贯通发展实践与价值理念、融合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的易于理解 and 接受的全新图景。要充分发挥现代化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议题引导和议程设置作用，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阐释和选题策划，更全面、更生动、更有效地讲好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，推动国际受众更好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、路径模式及其世界意义，更好地读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

坚持不断地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力量。加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宣介，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的价值理念、政策主张。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

的国际传播研究，针对国外受众策划推出简明易懂的知识读本，并将其融入媒体传播、人文交流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，增强中国道路、理论、制度、文化的国际认同。

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，广泛凝聚世界上正义与和平的力量，增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动。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，在海内外举办主题论坛和研讨会，围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、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广泛开展研讨，推动国际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参与，构建国际交流对话平台。做好“兰花奖”评选表彰，鼓励更多国际知名人士和机构为传播中华文明、促进文明互鉴与和平发展作出贡献。

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，推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转换与提升，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和对外叙事体系。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核心理念的对外话语研究，建好用好对外话语创新基地，加强对外翻译转换和传播，用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、具有亲和力的语言和表述传播，针对不同国家、不同群体特点开展区域化、分众化传播，展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和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

以历史视野和时代情怀讲述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，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。秉持开放包容，坚持守正创新，实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程，深刻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，讲好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、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贡献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现实贡献、对建设人类美好未来将作出更大贡献。

加快建设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传播能力，积极主动营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。着眼长期性、整体性、战略性传播目标，加强顶层设计，统筹媒体传播、文化浸润和人文交流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传播机构。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造国际传播品牌，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进入世界知识体系，建设权威外文网络传播平台，加强国际传播协同协作，唱响国际传播大合唱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（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局长）

苏轼的《超然台记》： 苦乐与超越

□ 王金伟

宋神宗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九月，苏轼受命由杭州移知密州（治所在今山东诸城）。年底到任后，苏轼便开始主持密州的军政事务，并于次年写下《超然台记》。这是一篇兼叙事、抒情与论理的美文，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，可谓苏轼在密州人生的重要写照。

移守胶西、子由在济的喜乐

苏轼来到密州，首先是开心的。其一，官职获得升迁。来此之前，苏轼在杭州做通判。通判是州中次于知州的职位，如《神宗正史·职官志》所载，“知州掌郡国之政令，通判为之贰”，可以说是州郡的副长官，人数常常不只一员，而且军事权力受到限制。而到密州，苏轼担任“知密州军州事”，是主管一州行政、军事的“一把手”。由“副”而“正”，晋升的获得感是人之常情。知州能在政治上独当一面，又为胸怀抱负者提供一个有较大自主性的平台。这都是苏轼所希望的。况且，这是苏轼首次主政一州，他自然对这个相当于古时候“太守”的职位有明确体认。同时期创作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中云“为报倾城随太守”，是太守对满城百姓相随狩猎的积极回应，词作通篇慷慨任气、意气风发，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、射虎射狼，也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的身影。

其二，情感有所依托。苏轼到密州做官，胞弟子由（苏辙字）“适在济南”。苏辙在《超然台赋序》中说，子瞻（苏轼字）在杭州任职三年没有调动，因为自己在济南故而请求调来齐鲁之地。所以弟弟的任所当时在济南是苏轼自请来密州的重要原

因。苏轼、苏辙兄弟感情很好，二人早年一同离乡赶考、同年登榜步入仕途，此后终身相互搀扶，精神上也可堪为知己。在密州，苏轼修筑超然台，是请苏辙取的名。中秋饮酒望月，写出著名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又说“怀子由”。漂泊异乡多年的乡思，在朝中因反对变法而被迫外任地方的不得志，凡此种种，都因“移守胶西（代指密州）”、子由在不远处而获得很大精神慰藉。

日食杞菊、为苟全计的困苦

来到密州成为一方主官，苏轼却没有过上“滋润”生活，反而遭遇明显的困难与艰苦。一方面是条件艰苦。密州古属齐地，这里的土地自來就偏于贫瘠、盐碱化很重。农耕文明时代，土地资源关系民生根本，也同时制约了原本相对发达的渔盐工商发展。偏在一隅、交通不便的地理位置也对物质、人员流动产生了不利影响，以致这里“四方宾客不至”。特定的自然条件又造成了这里旱涝灾害较为频繁。苏轼到任时，密州灾害严重，持续大旱、蝗蝗肆虐，物质相当匮乏。这与他刚离任的江南富庶之地远不能比。在《超然台记》中，他将从杭州调任密州作了一番形象的比较：放弃了乘坐舟船的舒适快乐，而要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；放弃了有雕绘墙壁的华宅，而蔽身于粗木建造的简陋屋舍；远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，而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。因此，身为知州的他也面临着食材短缺的窘迫，以致“日食杞菊”，不得不找一些野菜来充实后厨。

另一方面是州务繁重。上任伊始的喜悦与得意尚未及细品，繁重的州

郡事务已迫在眉睫。因为权、责相伴，紧接职权而来的是沉重的责任。《超然台记》中写道，苏轼“始至之日，岁比不登，盗贼满野，狱讼充斥”。可以说，旱灾、蝗灾和匪盗成为压在新任的苏太守身上的“三座大山”，是他当好密州“父母官”亟待解决的重点任务。身为州官，上达朝廷、下接黎民，有时候会“两头难”。新法弊病重重又不能不执行，天灾人祸横行百姓悲惨，如何在不过政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救济人民，“为苟全之计”，殊费思量。苏轼由是遭受了比有限的物质艰苦更为持久和折磨的精神之困。《超然台记》以过半的篇幅探讨祸福、辨析大小，现实中所遭受的艰苦就是他哲学思辨的生活来源。

未尝不在、果蔬可饱的超然

当苏轼在密州遭受物质、精神双重困苦时，人们觉得他显然是快乐不起来的。然而他却宣称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，连头上白发也逐渐转黑，仿佛日子过得不错。《超然台记》“乐”字出现8次，甚至于最后苏轼满足地直呼“乐哉游乎”。困苦境地中出现了如此“反转”，得益于苏轼的超然物外、乐观积极的认识。

应辩证祸福小大。在《超然台记》中，苏轼分析人们孜孜以求福而辞祸但却往往不可得，原因是人欲望的无限与物质的有限之间的矛盾。如果“游于物之内”，就像钻到事物里面，看到的自然是横亘眼前的高大状态，进而被压迫，产生无法逾越的困难。因此美恶忧乐的产生源于自己认识的狭隘。明白了这般原理，就应该辩证地看待事物，善于发现事物的

“可观”之处，由此培养自己获得快乐的能力。因为物皆有可乐之处，“非必怪奇伟丽者”，这迥异于王安石“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”的观点。在苏轼另一篇文章《宝绘堂记》中，他提出君子要“寓意于物”而不可“留意于物”，懂得欣赏事物但不可沉溺其中，这样的话微小之物就可以让人快乐、极致之物也不会给人造成伤害。两文的思想是相通的。

要能够既来则安。面对困难，苏轼主张不应逃避，而要迎难而上。文中写道“雨雪之朝，风月之夕，予未尝不在”，表面上是说他无论天气的阴晴、时间的早晚，常常在超然台上游赏。超然台，其实是浓荫的密州，这句话实是苏轼对于自己在密州期间全过程融入这里、“完整版在场”的诗意表达。“哺糟啜醨皆可以醉；果蔬草木皆可以饱”，浊酒可以醉、粗蔬也能饱，这种苏轼式的达观，不正契合了儒家“复圣”颜回的箪食瓢饮而不改乐吗？孔颜乐处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大多数人只是说说，苏轼却真的做到了，正如他多年后在词中写的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需坚持积极自强。苏辙取《老子》中的语词，为密州修葺的高台定名“超然”。但苏轼的超然并非寻求出世、消极无为。政治上，苏轼积极作为。在《超然台记》中，苏轼说他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他的愚拙无能。其前半句应是真心话，后半句却是谦辞。在密州，苏知州带领民众祭山祈雨、田猎练兵，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地方难题，为官一任造福了一方。生活上，苏轼积极体验。考察历史遗迹，感悟先贤风采，从众多古人——姜太公、齐桓公、卢敖、韩信等身上思索正反两面的人生之道，获得历史的启示。一处前代废弃的台子稍加修葺就能“高而

安，深而明，夏凉而冬温”，园子里粗糲的蔬菜、池塘中钓取的游鱼加上高粱酒、熟糯米，就可资其乐游。这正是苏轼的本事！文学上，苏轼积极开拓。密州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传世佳作。如其出猎词、悼亡词分别是豪放、婉约词之极品，中秋词、清明词更是同类题材之巅峰，无怪乎有人说苏轼将密州变成了其词创作的“蜜乡”。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有一个著名的理论——“穷而后工”，意思是文人越是窘困不顺，作品就有可能写得越好。身为父母官的使命如一副重担，造成了苏轼的压力和困顿，却在客观上也促发了他沉淀情感、凝练文学佳作。词中“东坡范式”的横空问世，与《超然台记》等诗文佳作的写就，都堪称由困境苦楚玉成的华章。

清代金圣叹盛赞《超然台记》“手法超妙”，言之不虚。但透过表面深入考察，驾驭高超艺术技巧的是作者深邃的精神力量。惟其赋予真情实感，文章才能言之有物，进而感动人心。正如人们传说的——人生缘何不快乐，只因未读苏东坡。苏轼深谙“游于物之外”，故可“无所往而不乐”。在密州，他超脱了得失苦乐，实现了人生境界的跃升。而且，可喜的是他未吝笔墨，将个中委曲尽录于纸间，后人于是有幸得以读之、赏之、叹之、鉴之！

